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德】余凯思 著
孙立新 译
刘新利 校

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

——1897~1914年中国与德国的相互作用

Herrschaft und Widerstand in der
"Musterkolonie" Kiautschou.
Interaktionen zwischen China und
Deutschland, 1897-191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德)余凯思著;孙立新译. —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1

ISBN 7-5607-2917-7

I. 在…

II. ①余…②孙…

III. 德国—侵华—史料—胶州市—1897~1914

IV. K25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3087 号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 邮政编码:250100)

山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莱芜市圣龙印务书刊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880×1230 毫米 1/32 20.25 印张 519 千字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78.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出版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排序)

于 沛	马大正	朱诚如
成崇德	李文海	陈 桦
邹爱莲	孟 超	徐兆仁
戴 逸		

【德】余凯思 著

孙立新 译

刘新利 校

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

——1897～1914年中国与德国的相互作用



山东大学出版社

根据 Klaus Mühlhahn

***Herrschaft und Widerstand in der "Musterkolonie" Kiautschou.
Interaktionen zwischen China und Deutschland, 1897—1914***

R. Oldenbourg Verlag, München 2000

译出

由德国 Inter Nationes 基金会资助翻译



总 序

纂修清史是我国新世纪标志性的文化工程,它包括 3000 余万字的清史主体工程及文献、档案整理和编译工作。广大史学工作者正以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努力做好清史编纂工作,科学总结历史经验,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世界各国从分散发展到趋于一体,大抵从 15 世纪、16 世纪开始,直至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形成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和世界体系。清朝从 1644 年到 1912 年共延续了 268 年,这是世界历史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的转折时期。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却依然以“天朝大国”自居,闭关自守,使封建社会的中国越来越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洋枪洋炮面前不堪一击;西方列强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在 18 世纪世界历史的大变局中,康乾盛世不过是中国封建社会“落日的辉煌”,而到 19 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清朝日益衰颓,已奏起了“落日的挽歌”。因此,研究清史,确定它的基本内容,以及确定研究它的基本理论、原则和方法时,不能脱离清王朝社会发展过程中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

在编纂清史时要有世界眼光,这已是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识。不仅要把清史放到世界历史的范畴中去分析、研究和评价,既要着眼

中国历史的发展,又要联系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而且还要放眼世界,博采众长,搜集和积累世界各国人士关于清代中国的大量记载,汲取外国清史研究的有益成果,为我所用。正是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决定编辑出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以下简称“编译丛刊”)。

清朝建立之初,曾与和世界各国保持一定程度上的接触。后来中国的大门一度被关闭而后又被强行打开,这期间,外国的传教士、商人、外交官、军队、探险家、科学考察队蜂拥进入中国,东方古国的一切都使他们感到惊奇。基于种种不同的目的,他们记录下在华的所见所闻。这些记录数量浩瀚,积存在世界各国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或私人手中,成为了解清代近三个世纪历史的珍贵资料。由于西方人士观察、思考和写作习惯与中国人不同,他们的记载比较具体、比较广泛、比较注重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方面,因而补充了中国史料记载的不足。“编译丛刊”将从中选取若干重要资料译介给国内的读者;对早年问世的具有开拓性、奠基性价值,但不为中国学术界所熟知的作品,我们也将同样给予关注;此外,对反映当代国外清史研究新的学术思潮、前沿问题、热点问题和重要成果的学术专著,“编译丛刊”也将及时地介绍给中国学术界。

从中国史学的历史与现实出发,有选择地介绍国外新史学的一些理论与方法是必要的。如西方历史学家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学的界限变的越来越模糊了”,主要是强调扩大历史学家的视野,拓宽历史研究的选题;又如提倡“自下而上看的历史学”,努力将社会精英的历史变成社会大众的历史,将千百年来隐藏在历史幕后的社会大众推上历史的前台。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研究整体化趋势的推动下,出现了一系列历史学分支学科,如社会史、人口史、民俗史、新经济史、新政治史、心理史、社会生态史、环境史、妇女史、城市史、家庭史等等,对于纂修清史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这些都将在“编译丛刊”的作品中有所体现。

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不同文明间不断交流和融合的历史。任

何国家的文化都是通过与异质文化的对话和交流获得营养,从而不断发展壮大。纂修清史必须排除闭关自守的文化排外主义的干扰,破除中西对立的僵化思维方式,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对待国外清史研究的一切成果,因为它们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愿“编译丛刊”在新世纪中外文化交流的广阔背景下,作为一座科学的桥梁、友谊的桥梁,为纂修清史做出更多的贡献。

于 沛

2004 年 5 月



原著前言

在过去很长时间里,殖民史一直是德国历史科学的一位“灰姑娘”。然而,世界越是因网络化和全球化而拢在一起,这一段共有但又充满不同经历和遭遇的历史就越受到注意。不管人们如何评价殖民经历,殖民史都无可否认地构成了“分享的历史”(shared history)的一部分,绝不可以被轻易忽略。但这也意味着:不应当只从一个方面来考察这段历史,必须用被征服者的看法来补充殖民统治者的见解并对两者加以对比。早就有人从理论上提出这一类拓宽历史视角的要求了,但是在实际研究中迄今尚未出现全方位的尝试。这个要求的确需要一种艰难的、平衡已经设立的各种专业和知识领域之间关系的努力,正如本书在历史与社会学之间搞平衡一样。其前提条件是熟知至少两个不同的民族和文化的实际情况和思想世界。此外,还涉及诸如文化接触、文化融合和相互作用等现象并与对不同条件和后果的叙述相结合的理论提问。下列关于德国在中国的殖民地胶州(1897~1914年)的历史的著作力争考虑这些思考。对于由各种各样的史料所提供的经验分析总是发生在理论反思的基础之上。它试图在德国的和中国的语境中穿梭变换,并且要说明,殖民历史是如何从相互作用、交叉和重叠中产生的。

本书于1998年夏天被柏林自由大学接受为博士论文。我特别感谢罗梅君教授(柏林自由大学),她以其坦诚的批判精神和耐心细

致的态度对本人的工作加以指导。从她的提示中,也从与之进行的共同讨论中,我获得了许多重要知识。我也感谢柯伟林教授(剑桥哈佛大学),他使我在进行此项研究工作时多次有机会到哈佛大学进行学术访问——对于我来说,每一次访问都是一种深受启发的、深入的知识经历。约翰·E·施雷克尔教授(瓦尔塞姆伯兰迪斯大学)著有关于胶澳租界问题的标准著作,他对我的工作予以了友好支持,我感谢他正如感谢柯文教授(韦莱斯里学院)一样;在我的工作陷入理论困境时,柯文教授曾给予我关键性的指导。我感谢贺远刚教授(康斯坦茨大学)对手稿的细心审阅和大量专业性评语。我也感谢他和《国际史研究》丛书其他几位编委把我的著作收入其中。我同样感谢伯恩德·马丁教授(弗赖堡大学)和费路教授(柏林洪堡大学)给予我的重要提示和帮助。

我还要感谢下列朋友、同事和教师,他(她)们不惜花费时间,用言语和行动给予我莫大支持:徐义圃教授(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耿云志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赵得绪(音译)教授、臧健(音译)和张寄谦教授(北京大学)、陈三井教授、张玉法教授和熊秉真教授(台北“中央研究院”)、张启发(音译)教授(台北故宫博物院)、朱茂铎教授(济南山东大学)、汉斯·克里斯蒂安·施蒂希勒博士(目前在北京)、孔祥吉教授(剑桥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墨柯博士(爱尔福特大学)、唐田慕博士(柏林自由大学)、海伦·约尔根森硕士(哥本哈根大学)。

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下列机构曾给予我许多帮助:弗赖堡军事档案馆、柏林联邦档案馆(原先在波茨坦)、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档案馆和图书馆、台北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北京国家图书馆、马萨诸塞剑桥哈佛燕京图书馆、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斯图加特对外关系研究所、柏林普鲁士文化遗产国家图书馆和慕尼黑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德国研究协会同意为本书提供印刷费,对此我十分感激。

我是在1994年由罗梅君教授组织的德中关系学术讨论会富有成果的讨论中获得从事该项研究的启发的。后来我又参加了编辑出版关于胶澳租界的史料集《“模范殖民地胶州”。德意志帝国在中国的扩张。1897~1914年的德中关系。史料集》(罗梅君主编,柏林1997年)工作,该史料集为本博士论文框架内的特殊论题提供了经验性研究基础。

在写作本书的全部时间里,我得到了我的家人的大力支持。我感谢我的父母阿道尔夫和海尔嘎·密尔汉给予我的多方面帮助。我的妻子海珂·弗里克给予我的支持更是不胜枚举,对此我非常感激,作为一位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女汉学家,她还在许多细节上给予我具体的帮助,若干思想是在共同讨论中形成的。在我从事胶州问题的研究的过程中,我的女儿索菲亚和克拉拉相继出生。她们是我永不枯竭的灵感泉源。

1999年7月于马洛夫



著者中文本前言

这里所呈现的关于德国在中国的殖民地胶州的历史专著曾在 1998 年以汉学专业的博士论文名义提交给柏林自由大学,后来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加工修订,在 2000 年由慕尼黑奥尔登堡出版社出版了德文本。本书的基本观点是以下列考虑为基础的,即必须从德国和中国两方面来写作殖民史。单方面的观察方式无法对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作出公正的判断。在胶澳租界(或者说今日的青岛)内部和它的周围地区,德国的历史与中国的历史最终相互交织在一起,两个社会相互交叉,相互纠缠,难分难解。这个现象此间在国际讨论中也被称作“纠缠的历史”(entangled history)。然而,胶澳租界只是许多可以证明不同的民族历史相互纠缠的历史场所之一。其他的中国城市,如上海或者天津,在 19 和 20 世纪也表现出类似的发展特征。在 20 世纪,这个进程以多种方式超出殖民地范围并随着全球化而扩展到全世界。自然,在不同的地方具体情况千差万别,殖民形势让位于别样的关系,但是不同的、先前被分隔开来的历史之间的融会合并却可以经常地并且在许多方面被观察到。这一过程绝不否定在所有这些接触区域——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存在着冲突和紧张关系。这些冲突,以及对例如中国人的歧视和虐待同样属于共同历史的一部分,正如人们乐于称道的文化交流和相互理解的积极成果一样。恰恰是双重角度的观察方法具有这样的优点,即决不描绘一幅黑白图

画,而是要说明实际关系的复杂多样性。

如果现在重新写作,我可能会对本书的个别段落作别样的表述,但决不会对其基本观点作任何改动。本书应当开启有关殖民地历史的双重角度,因此,在写作时我始终考虑着两方面的读者。我过去和现在都希望德国的读者可以以特别的方式从中国的角度获益,而中国的读者也可以从德国的维度得到有用的东西。我衷心希望本书的翻译对于理解各自的、他者的历史能够有所帮助。

对于我来说,中文本的出版是一个莫大喜悦。

如果没有许多同事和朋友的支持,本书的翻译是不可能实现的。首先我必须向孙立新教授表示衷心的感谢。他从一开始就对本书的翻译计划予以积极支持,亲自承担了翻译工作并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他的翻译是杰出的,值得赞许。德国 Inter Nationes 基金会为翻译工作提供了部分资助,中国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将中译本收入《编译丛刊》并从多方面保障了它的出版,对此我深感荣幸和感激。对于德国奥尔登堡出版社和中国山东大学出版社的支持我同样十分感激。本人的博士导师罗梅君教授最先提出了将本书翻译成中文出版的倡议,对此我铭记不忘。至于书中的缺点和错误,我本人理应负全部责任。

2004年8月19日于芬兰土尔库

译者前言

时断时续,历经两年多时间,终于完成了余凯思著《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1897~1914年中国与德国的相互作用》(慕尼黑2000年)一书的中文翻译工作。翻译工作之所以持续了较长时间,一方面因为原著理论性较强,许多新概念和新观点需要仔细斟酌并选择恰当的中文词汇复述出来;另一方面也因为我日常事务比较繁杂,翻译工作只能利用业余时间进行。

余凯思(Klaus Mühlahn)是一位富有才华的年轻德国汉学家。他所写作的关于胶澳租界的历史著作不仅为近代中德关系史研究而且也为整个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引进了一整套新理念,读之令人耳目一新。对此,我将抽时间撰文予以专门介绍,这里仅就几个翻译问题略加说明。

首先是我有意将“Auswärtiges Amt”翻译成“外交署”,将“Reichsmarineamt”翻译成“帝国海军署”,与之相应,将各署的最高官员“Staatssekretär”翻译为“国务秘书”而不是“部长”。这是鉴于德意志帝国特殊的君主制政体而作出的选择,目的在于使之与西方民主制区别开来。在德意志帝国的政治体制下,中央各职能部门的最高长官主要是皇帝的大臣而不是对议会负责的部长。这种情况是值得注意的。

“德意志亚洲银行”过去普遍译为“德华银行”,这与德文名称

“Deutsch-Asiatische Bank”出入较大,似乎也应当加以改正。诸如此类的情况还有一些,我在翻译过程中颇费了些考虑。如此处理可否,敬请读者赐教。

对于原著引用的中文材料,我大部分都找到了中文原文,并抄录下来。个别引文,因为未查到原文,只好采用直译办法。同样,对于原著中提到的有中文名字的外国人、外国作家和一些海外华裔作家,我也尽量核实其中文名字,但仍有个别无从核实者,只好采用音译办法。这也是翻译的常规。

另外,原著中个别年代、缩略语和汉语拼音的拼写错误,我在翻译过程中顺便作了纠正,因属于细末问题,译著未一一加注。另一方面,译著省略了原著书末附的胶州湾历史地图和人名索引,这需要强调说明。

我衷心地感谢来自各方面的支持。德国奥尔登堡出版社提供了免费的版权特许,Inter Nationes 基金会提供了部分翻译资助,中国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将它收入了《编译丛刊》并为其印刷出版提供了资助,山东大学出版社也给予译者大力的支持和帮助。我感谢余凯思博士的信任和他对译稿的高度评价。我尤其感谢刘新利教授,她在百忙中挤时间对译稿进行了非常细致的校读和修正,这对于译文的质量无疑是一个重要保障。

限于本人的能力,原著中个别地方委实难以转译,硬译下来不免艰涩难懂,希读者见谅。

孙立新

2004年10月3日于济南

目 录

☐ 总 序	(1)
☐ 原著前言	(1)
☐ 著者中文本前言	(1)
☐ 译者前言	(1)

引 言	(1)
-----------	-----

1. 欧洲与非欧洲社会接触的维度	(3)
2. 殖民地历史编纂的范式	(7)
3. 文化间接触的结构	(23)
4. 写作方法和章节划分	(30)

第一章 武力与适应:在山东的政治经济相互作用 ...	(35)
----------------------------	------

1. 山东省的空间和社会经济结构	(38)
1.1 19 世纪山东省的地形学	(39)